

我军战例 攻心谋略运用

编著：韩秋风 杜 波

WOJUNZHANLI
GONGXINMOULUEYUNYONG

BIANZHU
HANQIUFENG DUBO

华 艺 出 版 社

1. 攻心夺气 兵不血刃取长春

长春位于东北的腹地，是贯通京哈路、长图路及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伪满洲国曾建都于这里，称之为“新京”。日本关东军占领长春时，曾在城内街道及近郊修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的工事，城中心的主要大楼和主要街道间，都有钢筋水泥的地下坑道连接。国民党军进入长春后，进一步加强并增修了不少工事，使长春成为一个有先进防御体系的新型城市。1947年我冬季攻势以后，长春虽然丢在我们的后方，但敌人仍配备比较强的防守力量。1948年年初，敌东北“剿总”副司令员郑洞国来到长春，组成第一兵团。3月，敌60军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仓皇退出吉林，进入长春，与敌新7军分守长春东西各半部。这样，敌人在长春的兵力就有新7军、60军以及收编的地方杂牌部队共10万人。敌人所以要固守这样一个孤城，一是形势所迫，首先必须有安身之地；二是舍不得丢掉这个可以向我东西南北进攻的战略“宝地”，想在我们的腹地安上一颗钉子，牵制我军主力，等待形势的变化。

1948年4月，东北局成立了第一前线指挥所（以后又叫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负责指挥长春围困战役。此时，外围战役已结束，郑洞国及其10万军队已被我10万大军团团围住，其空中增援和撤逃的道路也已被我切断，在长春城外50里的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封锁区，筑起一道坚不摧的“城外之城”，敌军成为瓮中之鳖。

“瓮中捉鳖”并非易事。此时驻守长春之敌，西边新7军是

曾骄横一时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有所谓“远征军”、“王牌军”之称；东半部是云南滇系的 60 军，虽到东北后屡屡受挫，士气不振，但还有相当的实力；其余那些东北的武装、土匪杂牌军改编的部队，也有一定的战斗力。这些敌人，只要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就决不会放下屠刀。因此，肖劲光实行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管齐下”的方针，从多方面摧垮敌人的斗志。首先是以军事斗争为手段，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完成封锁圈后，部队即行构筑工事，架设通信网，勘察地形、地物、侦察敌外围据点，做反突围方案。为了防止敌人突围和出击，围城部队作了纵深梯次部署，在第一线阵地上构筑了较坚固的工事，围城部队依托工事反击敌人的冲击。第二线阵地也构筑了工事。尤其是在机场的阵地上和西南铁路口敌主要的突围方向上，部署了战斗力较强的兵力。在纵深有利的地域部署了机动部队，一旦敌人突破我前沿阵地，就在运动中歼灭它。这样，在长春城外，我军的封锁线密密层层，纵横交错，水泄不通。

在围城 5 个月中，我先后打退了敌人最多达 5 个团兵力的 30 余次突围，毙伤俘敌近 3000 名，使敌人突围计划成为泡影。长春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其次，经济封锁也是围困长春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军在通往长春城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资料和牛马入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卡住了敌人的脖子，使 10 万敌军的命运掌握在我军手中。郑洞国为了生存下去，绞尽了脑汁。围城之初，他们经常在长春城外村庄抢粮抢柴，储存起来以备后用。后来我围城部队又集中炮火和高射机枪重点打击敌机，敌机有的来不及空投就仓皇逃窜，有的被迫漫无目标地乱投，很多粮食落到我军阵地或封锁区内了。据当时美联社一些“专家”分析，每天 40 架次空投粮食，才能供上长春需要。然而，实际最多每天才 12 架次，

再以后每天3、4架次，有的还投不中目标。因此，空投只能是杯水车薪。敌官兵饥饿难忍，遇到空投就谁抢到谁私留分吃，加深了内部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甚至发生械斗。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为了缓和矛盾，采取了恶毒的“杀民养兵”的政策，将城内50万居民的粮食，包括麸子、糠秕、豆粉等，全部搜刮殆尽，并将骨瘦如柴的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对我部队造成很大压力，我军既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又坚决粉碎敌人阴谋。肖劲光要求各级成立难民处理委员会，在前沿和后方设置大大小小10个难民收容所，发放了4000吨救济粮、6亿元救济金及500斤食盐，还帮助群众抢种荞麦、蔬菜，开展生产自救，使人民群众亲身体验到共产党的温暖，增加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愤恨，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封锁长春。

敌人的阴谋失败了，饥饿像幽灵一样徘徊在他们身边。许多正规部队每人每天伙食费仅能买一斤黄瓜，只熬些菜汤喝，其杂牌就可想而知了，就连郑洞国也只能啃些半生不熟的马骨头充饥。敌内部矛盾异常尖锐，人心浮动，朝不保夕。郑洞国惊呼：“长春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

在敌人内外交困、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肖劲光和萧华政委及时将围城部队的工作重点转到政治瓦解上来，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在部队中迅速展开。广大指战员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无比的智慧，创造了多种宣传形式。如广泛的阵地喊话，开始经验少，单纯用嘴喊，声音又小又容易暴露。后来，大家做土喇叭，利用各种掩蔽物，有的还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话筒，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其它宣传形式多种多样，如打宣传弹，在护城河内放宣传木船，将宣传品送到阵地上；缝制慰问袋，内装宣传品，开展过节送礼活动；给敌人送饭，请敌人过来吃饭，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给敌人。他们还

组织了城外的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众以及长春城内逃出的难民做工作，利用敌军家属和俘虏、投诚官兵对敌喊话，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城内敌人士气大跌、军心浮动，纷纷投诚，由土匪杂牌军到正规军，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步到携枪，由个别到整班整排地投诚。我军在各阵地前沿设立了投诚官兵接待站，在敌工部设立总接待所，负责安置这些投诚官兵。愿意留下的就转到吉林后方留守处，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有些合适的对象留下或派遣回去做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至9月底，共接收投诚官兵1.35万余人。

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瓦解放军工作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即在敌军内部，尤其是对60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也广泛开展起来，朱总司令还以滇军老同事的身份，亲自给孙渡、卢浚泉、曾泽生写信，要他们发扬滇军护国的光荣传统，站在人民一边。他们还将被俘军官中经过教育表现较好者，放回城去做工作。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敌60军军长曾泽生于10月17日宣布起义，当晚我接防部队悄然进城，60军同时撤出城外，开往九台休整。敌新7军见后院起火，大势已去，于18日主动投降，19日我军接防。最后，郑洞国在“无可奈何花落去”、众叛亲离的形势下，于21日率部投降。我军兵不血刃，取得了具有坚固防御体系的长春古城，为我军和平解放大城市开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

【点评】

长春围困之战，是辽沈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例。它从1948年5月23日长春外围战斗结束，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历时5个月。在我军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以及我军攻克锦州这一决定性胜利的影响下，守敌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郑洞国被迫投降。

长春这座城市兵不血刃，和平解放了。这是肖劲光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一幕精彩的、不战屈敌的活剧。

在长春围城之战中，肖劲光实行“三管齐下”的方针，是以军事斗争和经济封锁为政治瓦解的基础，就是说，是把军事和经济作为攻心战的基础。

首先，把军事力量作为有效进行攻心作战的强大军事后盾。军事力量，主要是指武器装备的质量和数量、军队素质、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以及军事科学的状况等。恩格斯在谈到炮的作用时指出：“炮兵对进攻的步兵横队或纵队一向是具有优势的；用震弹进攻几次成功的齐射或者向纵队发射两三个实心弹，就能大挫伤敌人的士气。”（《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1卷，第442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实践证明，军事行动规模越大，武器装备破坏性越强，敌军的精神压力越大、士气越低。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政治攻心瓦解，收效则越大。肖劲光指挥我10万大军在对长春之敌实行“三管齐下”的过程中，首先是以军事斗争的手段，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完成对长春之敌包围后，首先是构筑工事，架设通讯网，勘察地形、地物，侦察敌外围据点，做反突围方案，使我军的军事封锁密密层层、纵横交错、水泄不通。这种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给敌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使心理攻击收到了良好效果。

其次，把经济封锁作为攻心作战的物质基础。经济力与将士的物质生活条件密切相关。恩格斯指出：“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206页）将士，首先是物质的，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因而离不开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如被服、粮食、药品及其他各种军需物质。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家早已朴素地认识到了

这一点。《管子》中写道：“国贪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管子·七法篇》我军朱德元帅说过：“假如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身体顶不住，有的就会跑。”（《朱德选集》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在敌军缺粮少穿，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我军开展攻心作战就更为有效。因为，经济实力与军人的意志行为密切相关。士气，是意志的最高或集中表现。而意志行为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意志，是人的意志，只有人与物——武器装备结合为一个统一体，才能把人的意志行为物化为物质力量，使人的意志行为得到实现，使士气得到表现。所以，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军人的意志则容易被瓦解。肖劲光为了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不仅在军事上积极准备，坚决打击，并且积极进行对长春之敌的经济封锁，使敌正常的生活消费无法保障，使敌人的许多正规部队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仅能买一斤黄瓜，只熬些菜汤喝，就连郑洞国只能啃些半生不熟的马骨头充饥。敌人为了生存，相互抢夺空投物资，矛盾异常，人心浮动。我军通过对敌人的现状给予充分的揭示，指明其惟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否则将死路一条，使我军的政治攻势收到了巨大成效。

2. 惑敌攻心 靳营长智赚敌军

湘鄂西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的重要战略区之一。因此，敌人对这一地区经常大举进行“清乡”和“围剿”。为了巩固和扩大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1932年夏天，湘鄂西根据地荆门警卫营，遵照贺龙军长的命令，在荆门、沙市、宜昌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他们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袭扰敌人后方，钳制敌人向湘鄂西根据地进攻的兵力。当时该营辖4个连队，全营只有240多人、210支枪、50多匹马。不仅武器差，而且子弹也很少，每人平均不到5发，都是洪湖兵工厂土造的，其中一部分还打不响。在缺枪少弹的情况下，营长靳家香、政委张大明商定去找贺军长和关政委，想要上级调给一批枪支弹药。当向首长反映部队武器弹药缺乏的情况时，贺军长点了点头，笑着对他们说：“我这里没有武器，你们自己想办法，缺少武器，去找敌人要。”贺军长的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引起了他们的深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在向游击区进发的途中，部队经过紧张的行军到了一个名叫万里镇的村庄，正准备宿营休息时，忽听得远处传来了一阵阵锣声。这是怎么回事呢？经过了解，原来这个锣声是当地地主武装互通情报的信号，意思是发现红军部队来了。

靳营长计上心来，立即派人通知各个驻地的战士也把锣敲起来。这一敲不打紧，战士们纷纷猜疑开了：“我们敲锣，不是等于告诉敌人我们驻在这里，那不正好中了敌人的计吗？”“打游击，从来都是打打藏藏的，倒没有见过这么个打法的……”黎明

时刻，哨兵报告说，在离我驻地约两里远的地方，发现有敌人朝我庄上走来了，营长立即命令做好战斗准备，并通知说，不管敌人来多少，不要先开枪，如果敌人少，最好是抓活的，这样既节省子弹，又能了解敌人情况，还不至于暴露自己。不一会，有十几个敌人骑兵接近了。这时，营长要活捉敌人的决心更坚定了，他叫战士把锣猛打猛敲，煞是军情紧急，昏头胀脑的敌人，听到紧密的锣声，催马扬鞭，直朝这边奔来。到村庄后，气势汹汹地朝站在院墙上敲锣的人问道：“你敲锣，共军在哪里？有多少？”我们敲锣的战士回答说：“不知道，因为周围都在敲，我不敲行吗？”那个家伙一听是这个回话，恼怒地骂道：“他妈的，真是活见鬼！就数你们这里敲得凶，害得老子好苦，天不明就出发，急得饭都没顾上吃，一口气跑到这里，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快下来给老子开门，弄水喝，做饭吃。”敲锣的战士装着连声应道：“好，好，好。”马上从梯子上下来了。刚一开门，早已埋伏在院子里的我2连战士，一跃而出，夺枪的夺枪，拉马的拉马，抓俘虏的抓俘虏。这时，敌人才知道上了当，慌作一团，只喊饶命。惟有一个站在最后的敌军官，尚未下马，一见情况不妙，便掉转马头，夺路逃跑。可是敌人的退路早被我1连切断，绊马索一拉，他便从马上滚落下来，未来得及反抗就当了俘虏。

这次战斗，仅用了十来分钟，生俘了13个敌人，缴获了5支驳壳枪、8支马枪、13把马刀、13匹马、700多发子弹，战利品中还有一面青天白日的破旗。胜利后的战士们才知道，原来营长叫敲锣，是在向敌人鸣锣收礼啊！歼灭这伙敌人后，警卫营的同志们想乘机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于是决定去捣敌人的老巢。黄昏时刻，部队稍许休息后，便连夜冒雨向敌人驻地张家大湾奔袭而去。可是情况却出乎意料，扑了一个空。原来敌人发觉我军宿营万里镇后，派出人马乘雨夜去袭击万里镇了。这时，营长便马上召开连干部会议，研究下步行动方案。大家商议，将各连缴

获敌人的服装集中到一起，把1连化装成国军，把缴获的那面青天白日破旗也打了起来。同时，还叫刚被俘虏但愿意合作的敌人团总部书记官，以张国栋的口气起草了一份命令，随后部队便开始行动。化装的1连担任前卫，行军时将红军的一切标志都取了下来，规定各连都不打红旗，连马刀和驳壳枪上的红绸子也都一律摘掉。由骑兵连长化装成敌人的营副，还佩戴了国民党的上尉军衔。他带领部队大摇大摆地走到离万里镇约七八里远的一个村庄附近时，尖兵班的同志报告说：“前面发现有部队，打的是红旗。”营长一听，奇怪！哪里来的这支队伍呢？于是命令号兵，吹问答号。可是那个部队没有号兵，不能答号。营长告诉尖兵，要他们派一个人过来联络。对方看见我们打的是青天白日旗，很快派了一个人来。1连连长警惕地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是红军吗？”对方连忙解释说：“长官，别误会，我们是保卫团的。”“好一个保卫团的，你们分明是红军，保卫团的还打红旗吗？”对方吓得哆哆嗦嗦解释说：“我们确实是保卫团的，打红旗是为了欺骗民众的。”其实，这时从敌人的行装上，早已知道是敌人的保卫团了，故意盘问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罢了。

接着，1连连长便将敌团总张国栋的命令递交给他们的指挥官。那个蠢货拿着这道命令，上下打量，逐字逐句地看了一遍，只见上面写道：“令2团3营协助剿灭万里镇、太和场、鲫鱼口一带共军，在围剿期间，本团所属分队和清乡队均归新营长统一指挥，不得有误。等因奉此，仰照执行……”。因为命令上找不到半丝破绽，敌军官当然不会有任何怀疑，生怕怠慢了国军的长官，拿着命令连忙应声说，一定听贵长官的指挥调遣。这时，机智的1连连长随即指令敌军官把队伍集合起来，说新营长要给弟兄们训话。

新营长不以为然地还了个礼，迈着四方步走到队伍跟前，先命令士兵们把枪架好，退后三步坐下，然后便神气十足地开始了

训话：“弟兄辛苦了！本营奉令前来执行任务，因为天下大雨，路途较远，所以迟来一步。由于你们不辞劳苦，冒雨袭击万里镇，本营长回去后一定帮你们报功请赏。但有人向我报告，说你们这次行动，有违蒋总裁围剿之方略，事情都叫你们给办坏了。本营长坚决执行上司指令，绝不宽恕，一定要按军法从事。”说毕，随即挥手，我们的两个士兵和一个传令兵，扑上去就将敌人的指挥官五花大绑起来，押到了一边。这时，继续训话的靳营长，越骂火气越大，吓得敌军想动不能动，想跑不敢跑，个个像中了定身法一样动弹不得。最后，营长命令缴他们的枪。这时，早就埋伏在附近的2连、3连、骑兵连和1连从四面八方一齐冲过来，把这股敌人收拾得一干二净。

这一仗在没有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一举歼敌157人，缴获步枪33支、子弹500多发，还有一批刀、矛、鸟枪和鱼叉。战士们高兴地笑着说：“谁说保卫团很糟糕，执行命令不是很好吗！”

【点评】

湘鄂西根据地荆门警卫营，遵照贺龙军长的命令，在同敌人的较量中采取迷惑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方法将敌人活捉，就是以智取胜的成功范例。

迷惑敌人，就是采取各种行动，运用各种手段袭扰敌人，造成其心理上的紧张恐慌、疲劳、烦躁、错觉迷乱等，由此使其对情况判断出现偏差，决策出现失误。靳营长迷惑敌人，采取了三部曲：第一步，敌人敲锣，我也敲锣。我军战士们的敲锣，弄得军情紧急，使敌人昏头胀脑，疲惫不堪；故人在迷乱之际，被我歼灭一小股敌人；第二步，在捣敌老巢扑空后，又决定利用缴获的战利品化装敌军，同敌军接触，进一步迷惑敌人；第三步，拿出已起草好的假命令，调遣敌军官兵，并利用“训话”之际，将敌军一网打尽。这三步，每一步都使敌人不明真相。

毛泽东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中指出：“扰乱是游击战争袭击战术的附属部分，但也是必要部分，目的在于增加敌人不安，减杀敌人威势，以造成我们消灭敌人或逼退敌人的条件。……欺骗敌人便于我方在他处之行动，或在恐吓敌人，增加其惊慌心理。”（《毛泽东军事文选》第98页）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军十分注重运用迷惑手段对敌人进行心理打击，即不断地迷惑、破坏、疲惫和消灭敌人，使敌人不愿和我们作战，而又不得不和我们作战。……在敌人后方，如被敌人正式围攻，敌人寻求我军作战时，我军也巧妙避开，偏偏不和他们作战。所谓“避实击虚”、“避强攻弱”、“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能进能退”、“速战速决”等，都有迷惑敌人之意。迷惑敌人的目的是给敌人造成心理紧张、不得安宁、心智迷乱、疲惫烦躁、思维混乱等。其不在于消灭多少敌人，也不在于争取或占领了多少地盘，而在于所给敌人造成心理打击。在实际作战中，这种心理打击，常常使敌人不谙实情，不知所为，甚至把虚情、假情误以为实、误以为真，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作出错误的决策，采取错误的方法，实施错误的行动，从而在双方作战态势的构成上犯更大错误，由此被置于更加被动的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迷惑所造成对敌人的心理打击，其获得的有利态势或战场主动，要比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夺占一些地盘，具有更大的战略意义。而这种意义的价值则直接体现在可以换取更大的胜利，争取更大的主动上。眼前的扰敌击敌效果越好，敌人的心智越迷乱，判断越失实，决心越失误，我方歼敌的战机就越多越大。所以，作为指挥员，切要把眼睛盯在战场全局这个大棋盘上。

3. 致敌恐惑 阳明堡威震敌胆

1937年10月16日前后，八路军129师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进抵山西阳明堡以南小滹沱河南岸的苏龙口、刘家庄地区，执行在代县、阳明堡、崞县之线以东一带打击进犯忻口的日本侵略军的任务。769团的同志们不断发现敌机由滹沱河北岸起飞，轰炸忻口、太原的国民党军队。经过侦察，查明敌人机场在阳明堡西南地区，距我驻地苏龙口约4公里。又从机场逃出的民工口中，得知机场有警卫部队200余人，主要兵力配置在机场北端，敌机集中放列在警卫部队的东南侧，防御工事仅有简单的掩体和掩蔽部。根据这一情况，团首长决心利用夜暗乘虚袭击机场，击毁敌机，震慑日军，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并支援国民党军队在忻口的作战。尔后，研究确定了具体的战斗部署：以第3营为突击队，负责袭击机场，击毁敌机；第1营袭击和钳制崞县之敌；第2营（欠第7连）为预备队；团迫击炮支援第3营战斗。

10月9日入夜，各分队分别向预定地区开进。第3营偷渡滹沱河后迅速展开：10连由机场西北面攻击，负责歼灭警卫部队；11连由机场东面实施主要攻击，负责击毁敌机；9连负责警戒阳明堡之敌；12连为营预备队，营长随11连行动。

这时机场上万籁俱寂，敌人都还蒙在鼓里。部队越过铁丝网，悄悄地进入机场。10连和11连分别向着各自的攻击目标跃进。

11连的战士看见敌机果然整整齐齐地分三排停在机场中央，

心里好不高兴。有个战士轻声骂道：在天上你要威风，在地上叫你威风扫地。同志们迅速地逼近敌机。突然，机场西北角枪声大作，10连开始收拾敌警卫部队了。11连更是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机倾泻，仓皇应战的敌人寡不敌众，无力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在机舱里值勤的驾驶员被惊醒后，盲目开火，结果是后边飞机的机枪射击前边飞机的机体，演出了自伤自的滑稽戏。3营营长赵崇德乘势大声喊道：“快！手榴弹，往飞机肚子里扔！”这一指点非常及时见效，只听“轰、轰”几声，几架敌机中弹起火。油助火势，风助火威，霎时，机场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敌机全部葬身火海。等到敌步兵和装甲部队赶来增援时，我已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任务，及时撤出了战斗。

此战仅用一个小时，击毁敌机24架，毙伤敌100余人，创造了我军以步兵歼敌数架飞机的范例，对日寇在晋北地区的空中突击力量的沉重打击，使日军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士气受到了严重削弱。

【点评】

这是我军利用近战夜战乘虚而入，致敌恐惑、夺敌士气的成功战例。利用夜暗迅速隐蔽地接近敌人，以相应的手段突然发起攻击，造成敌人的恐慌，出其不意，震撼敌胆，是我军利用近战夜战夺敌士气、振我军威的一个重要战法。在阳明堡作战中，我军发挥了这一优势，致敌恐惑，一举击毁敌机24架，毙伤敌100余人。这不仅是我军事斗争的胜利，也是攻心作战的胜利。乘虚而入，是进攻作战的重要原则，也是摧垮敌士气的重要途径。阳明堡机场守敌200余人，兵力比较单薄；守敌设防不严，工事简陋；日军不善夜战，对我夜袭缺乏认识和准备，是敌虚之所在，我在及时掌握敌人的虚实的情况下，避实而击虚，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从心理作战的角度来说，在过去缺乏夜视器材的情况下，近战、夜战可以使部队如同神兵天降，能够造成敌人的极度混乱和恐慌。勇于与敌人打夜战、近战，不但能最大限度地削弱和限制敌人技术装备的优势，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以突然、勇猛、准狠的战斗动作给敌以沉重的心理打击，造成敌人的恐惧感和迷惑感。夜战、近战通常是秘密准备，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迅速迫近到敌人的面前，或者是白刃格斗，或者是抵近枪战，或者是紧紧围困，使危险突然降临到毫无心理准备的敌人面前，这必然使之产生极度的恐惧和不安。生理学研究表明，恐惧会抑制有机体的积极活动状态，表现出面色苍白，心跳加快，呼吸急迫，甚至全身僵直、颤抖，四肢瘫软无力，内分泌失调，从而丧失战斗力。对此，徐向前元帅指出，夜战能“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于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神速运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戒备，高枕而眠，便于我出其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便于我发挥近战特长，迅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易弄清红军的兵力，枪声一响，草木皆兵，也便于我收以少胜多之效。”（徐向前：《历史的回顾》1988年10月）

近战夜战可以造成敌人的盲从心理。对此，粟裕将军也有过深入的论述：“在敌行进中及驻止时，日夜不断予以袭扰，尤其夜间袭扰最为有效，使敌白天行军作战，晚上又不能安心休息，增加其疲劳，挫伤其士气。使敌完全陷于被动，使我地方兵团有取得主动之余地。”（《一年来敌我战术之演变》1941年1月30日）夜间作战视度不良，易于我采取各种佯动、欺骗手段迷惑敌人，调动敌人，使敌人不知虚实，难辨真假。如若信以为真，又经常上当受骗。如若置之不理，又怕束手就擒，只能盲目应对，疲于应付。在夜战、近战中，我预有心理等各方面的准备，处于主动、积极的状态中。而敌人则是皆无准备，面对我发起的夜

战，必然是处在疲惫、慌乱的境地，由此而导致人员反应迟钝，思维不畅，状态消极，动作失调，从而使战斗力大大削弱。上甘岭战役中，敌人在我坑道口构筑了数个地堡，并组成交叉火力网，地堡前又设置了音响障碍（罐头盒）。到了夜间，只要一有响声，敌人就以为是我军出动了，所以，各地堡就一齐开火。当我志愿军摸准了这一规律后，开始是用投罐头盒的办法挑逗敌人盲从射击，久而久之，敌人才发觉这是挑逗，因此，罐头盒再响也就不射击了。这种从射击到不射击、从盲从到懈怠的变化过程，正好给我军袭击小组出动“拔点子”作战提供了战机。我军乘机将对我坑道口有威胁的地堡全被炸毁，保证了我军出入坑道的自由。

战争发展到现代，技术先进的军队已经大量地装备了夜视器材，过去看不见的东西，现在不但看见了，而且还能看得很清，同时解决了瞄不准、打不上的问题。这种情况，使我军传统的夜战遇到了挑战，传统的夜战还能不能获得像以前那样的作战效益及心理打击效果，已经成为必须认真研究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4. 致敌迷乱 太行军民困沁源

1942年10月21日，日军分兵14路，向我太岳根据地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敌人妄图采取远距离奔袭的办法，扑灭我领导机关，聚歼八路军主力。然而，我们的领导机关也已转向外线作战。当敌人进占沁源时，已成为一座空城。

敌人重兵占领沁源后，不仅在全县重要村镇驻扎据点，进行分区“清剿”，并且大兴土木，筑碉堡，修公路。敌人在城关外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山岳剿共实验区”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其目的是为了搞他们的怀柔笼络，来逐步腐蚀人心，“蚕食”我方的根据地，以便成为它的“治安区”。沁源县约有8万人。在党的领导下，这里的人民经历了多次残酷“扫荡”的考验。加以我转到外线去的主力部队，也时而乘虚向敌据点主动出击，敌人分区“清剿”的阴谋遭到严重痛击，迫使敌人不得不把36师团的一个大队及大部伪军抽走，只留下69师团两个大队及伪军一部，来死守城关及几个孤立据点。

敌人的“军事清剿”阴谋破产以后，便在政治上加紧推行它的怀柔政策，以图欺骗、笼络群众，巩固它的占领区的统治，来实现它的“山岳剿共实验区”的梦想。根据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同志的指示，县委决心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并把我38团从外线调回腹心地区，一起执行长期围困沁源敌人的任务。全县共划分为11个“战区”，以38团和25团、69团一部为骨干，结合全县民兵和基干队，组成13个游击集团。一场群众性的围困沁源敌人的斗争，